

鄂伦春“集落”(乌力楞)构成规模考

——从民族地理学的视角展开——

遠 藤 匡 俊*·张

政**

(2004年11月18日受理)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ut various findings concerning settlement size of the Orochon in order. The Orochon settlem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fieldwork mainly by Japanese scholars from the 1950s to 1960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scholars depended upon the elders' memories concerning their hunting-gathering way of life before 1940. As a result, the settlements of the Orochon as hunter-gatherers in many cases consisted of several households from 1900 to 1940. There were a few cases where one settlement consisted of just one household. So to speak,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s was not the scattered settlement pattern. So far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has been found in the world hunter-gatherer societies, such as those of the San, Mbuti Pygmie, Hadza, Hare Indian, Inuit, and Ainu. This was caused by the inter-settlement movement of households. The residents of the settlements were found in different settlements before the time they were surveyed. Theoretically,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did not cause the dispersed settlement pattern. The settlement size and pattern suggest that fluid residential mobility was common in the Orochon as hunter-gatherers from 1900 to 1940.

一、目 的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民族学者,对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人进行了多次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民族学调查。^[1]本文根据这些实地调查报告,和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民族学者的调查报告所记载的数据,对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的“集落”(乌力楞)的构成户数规模进行对比、考证。

本文的考察对象年代是:1900~1940年代,即定居前,仍处于狩猎采集生活状态下的鄂伦春社会。

从民族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在对鄂伦春“集落”的研究过程中,有以下2点不可忽视。其一,它与世界上其他狩猎采集民族一样,其集团成员(乌力楞的成员)存在着不稳定,即所谓的集团流动性的可能。而这流动性产生的背景又是多样化的。其二,其住房“撮罗子”以一系列横队排开

* 岩手大学教育学部 地理学研究室

** 中国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岩手大学客员研究员

的乌力楞排列状态,可能与其原始宗教信仰有关。〔2〕〔3〕不论是“集落”成员的流动性,还是其排列状态,都是以复数以上的构成员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各户都处在分散的状态下的话,那么“集落”成员的流动性,也就失去了其前提条件,而其构成排列状态也就不付存在了。正因如此,在对“集落”的研究过程中,搞清楚其构成户数规模和移动地理空间范围,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二、鄂伦春的季节移动和“集落”(乌力楞)

鄂伦春的“集落”,分布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周围,其一年中,夏季沿河流向上游移动,冬季则沿河流向上游移动,其移动路线沿河流呈椭圆形。〔4〕这种季节性的移动,常常是2至3户一起同行的,其同行的户数和家庭也不固定。〔5〕这意味着在季节移动的过程中,“集落”的构成户数和成员都存在着新的变化组合。“集落”夏季分散在各地,冬季在一定的地方集中这种季节性的移动,是在其主要的猎场范围内进行的。而4年至5年进行一次比较大的移动,这种移动主要是在猎场之间进行的。〔6〕这就存在着“集落”在做季节移动时,其夏季构成规模较小,而其冬季构成规模较大的可能性。因此,在同一时间,大范围地对其地理位置、构成户数以及人口等进行调查,逐一确认,是很困难的。

鄂伦春的住房“撮罗子”是由木杆、树皮、兽皮、等物组合而成的圆锥形家屋。移动时“撮罗子”的框架留在原处。〔7〕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遗留下来的“撮罗子”的框架数来推测移动前的构成户数。1942年6月,吉良龍夫,在激流河上游的实地调查中,发现了“驯鹿鄂伦春”遗弃的“冬季营地”。〔8〕从该“冬季营地”遗留下来的“撮罗子”的框架数,可以推测这是一个不超过7户的“冬季营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被遗留下来的“撮罗子”的框架,未必都是最近一次移动前,在那里居住过的人们所使用过的。之所以这样说,这是因为那些“撮罗子”框架,有可能是在不同时间,多次被使用过的。所以,从遗留下来的“撮罗子”的框架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移动前居住那里的户数,但这也只是一个概数。

另外,本文所指“集落”的定义是,包括短期居住在一起的,处在狩猎采集生活状态下的鄂伦春人的集合体。根据这一定义,如果要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搞清楚“集落”的分布与构成户数,就有必要根据实地调查和采访调查资料等,来确认谁和谁曾居住在同一“集落”里。

三、季节与“集落”(乌力楞)的户数规模

1934年6月,吉岡義人对诺敏河上游的6个“集落”,根河上游的7个“集落”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报告,秋葉隆认为:鄂伦春人的“集落”常常是由少则1、2户多则10余户的“撮罗子”而组成。其地理位置也多选择山谷底,或是缓坡地带。而“撮罗子”的设置排列状态,一般是相隔2、3间横向排列的。〔9〕

另外,秋葉隆根据对分布在根河上游地区的8个鄂伦春人的“camp”(营地)(平均户数为5.2户)和库玛尔路49个鄂伦春人的“所在地”(平均户数为9.4户)的分析认为:鄂伦春人的“camp”(营地)通常是由10户以下,5户左右构成的最多。〔10〕秋葉隆,在1936年的报告中所称的“camp”(营地)和“所在地”在本文中被认为与“集落”基本是同一概念。但应该指出的是,所谓的“camp”(营地)和“所在地”其中也存在着数个“集落”复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即使是这样,从其构成户数上看,在10户以下的占66.7% (18/48),5户以下的占37.4% (18/48)。其具体构成数据(参见表1)。

表1 按“camp”(营地)看其构成户数

Table 1 Number of Orochon settlements by number of households comprising each settlement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Greater Khingan Range in 1936

户数	1-5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计
部落	18	14	8	3	1	2	2	48

(根据秋葉 隆, 1936年的“大兴安岭东北部鄂伦春调查报告”(一)的数据作成)

1936年7月, 泉靖一在大兴安岭东部的绰尔河上游地区, 对鄂伦春人的12个“部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参见图1), 泉靖一在调查报告中所指的“部落”, 在本文中也认为与“集落”(乌力楞)基本是同一概念。在这12个“部落”中, 构成户数不祥的有2个, 而其中1个“部落”被认为可能由6户构成, 但未能确认, 所以本文不将其作为统计分析的对象。另外, 在一个由4户构成的“部落”中, 其中1户是被当局强制移动的结果, 所以这1户也不列入对象范围之内。这样经过分析、整理后的各“部落”的构成户数(参见表2)。

表2 按“部落”看其构成户数

Table 2 Number of Orochon settlements by number of households comprising each settlement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Greater Khingan Range in 1936

户数	1	2	3	4	5	—	9	计
部落	4	4	2	0	0		1	11

(根据泉靖一, 1936年的“大兴安岭东南部鄂伦春调查报告”的数据作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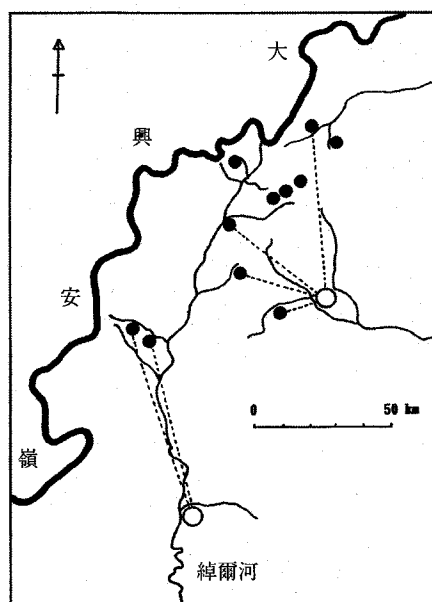


图1 1936年7月的大兴安岭东南部地区的“部落”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Orochon settlements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Greater Khingan Range in 1936

●: “部落”、○: 冬季的“部落”(根据泉靖一, 1936年的“大兴安岭东南部鄂伦春调查报告”的数据作成)

1943年2月,郡司彦对莫力达瓦旗的冬季“常住地”的构成户数进行了实地调查。他在报告中所称的“常住地”,不一定是单一的“集落”,其中也有数个复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即使是这样,也有85.7%(6/7)的“集落”构成户数在5户一下。^[11]

四、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记录的数据看乌力楞构成户数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民族学者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组织下,对鄂伦春地区进行了广泛地社会历史调查。其中就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乌力楞的社会构造及构成户数等方面也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但其大都是根据老人的回忆而整理的采访记录。根据《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所记载的数据,复原后的鄂伦春4个地区的乌力楞构成规模,参见表3。在这4个地区中,小兴安岭地区的乌力楞构成户数规模较小。17世纪以前的乌力楞多是由4~7户构成。^[12]那么,小兴安岭地区(表3中的I)的乌力楞的构成规模与17世纪以前的乌力楞的构成规模比较接近。而大兴安岭地区(表3中的II, III, IV)与小兴安岭地区相比,其乌力楞的构成规模则较大。以狩猎在大兴安岭地区的讷门河流域的文吉善所居住过的乌力楞为例,1910年时由4户构成,春秋两季分成两个小集团进行狩猎采集活动,冬夏季节则合在一起。这个乌力楞的构成户数则是以4户为单位被记录下来的。1928年左右,文吉善所居住过的讷门河上游乌力楞,冬夏两季集中时,有9户构成。到了春秋两季也分成2、3个小集团进行活动。同样,这个乌力楞的构成户数,也是以冬夏季节的构成规模被记录下来的。^[13]这样,根据对鄂伦春老人的采访调查数据,来对乌力楞的构成户数进行统计的结果是:大兴安岭地区的构成户数规模总体上较大,其中记录冬夏季节(或冬季)的构成规模的较多,而春秋两季(或春、夏、秋)的小集团进行活动则没有更多地记载下来。这可能与被采访者对集中生活时的记忆较深有关。

表3 1900~1940年间各地区的乌力楞构成户数规模

Table 3 Number of Orochon settlements by number of households comprising each settlement in the four districts of Greater and Lesser Khingan Ranges from 1900 to 1940

鄂伦春的主要 分布地区	每个乌力楞的构成户数(户)															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I. 小兴安岭	1		5	2	2	2		1			1		1			15
II. 多布库尔河、甘河流域						1					1	1		1	1	5
III. 呼玛河流域			1	1	2	2	3	5	2	1	4	2				23
IV. 托河、诺敏河流域		1		1		1		3	1	1	1					9
	1	2	6	5	4	7	5	6	2	5	5	1	1	1	1	52

本表对记录不祥和无法判断的数据不作为统计对象。(根据1984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数据作成)

另外,从上述实例来看,表3中的乌力楞可能有一部分是冬夏季节,集中时的构成户数,而那些随季节而分散活动的小集团,也未必都是乌力楞。由此可以推测,这也许就是日本民族学者的实地调查报告中所记载的“camp”(营地)、“部落”的构成规模(表1、2)比中国民族学者

的调查报告所记载的构成规模(表3)要略小的原因。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乌力楞成员是很不稳定的,即当时的成员已经可以自由地迁入或移出。^{[14][15]}而这自由地迁入迁出,就意味着集团成员的流动性的存在。而这种流动性与只进行季节性分裂,而其集团成员不变的离散聚合是不同。其集团构成员在离散聚合后也常常发生变化。

五、结 论

通过对日中两国民族学者,在不同时期对鄂伦春“集落”(乌力楞)构成规模的民族学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鄂伦春“集落”构成有以下二个特点:其一,“集落”构成规模随季节而变化,冬(或夏)季,集中时其规模较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存在着数个“集落”复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其二,当时的构成户数多在10户以下,而在一些地区5户左右的所占比例最高,而以一户为单位的虽然存在过,但其比例数很低。另外,从乌力楞的季节移动距离来看,至少在大兴安岭东南部地区,大约以直线距离50~60公里左右为半径,作为其季节移动的地理空间范围。

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鄂伦春“集落”,以复数以上户数构成的占绝大多数,从理论上讲,狩猎采集民族的集团构成员(乌力楞构成员)的加入或迁出,即集团的流动性,在2户以上构成的前提下,就有发生的可能性。而从“集落”的构成户数规模上看,已具备了这一条件,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研究产生集团流动性的社会背景,进而搞清其与世界其他狩猎采集民族在流动方式上的差异。

(附记)本研究是“关于狩猎采集民文化的国际共同研究”课题的一部分,所使用经费为日本岩手大学,平成15(2003)年度的活性化经费,及日本学术振兴会,平成15、16(2003、2004)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C))2课题号:15520492)另外,本文的核心部分,是根据作者的〈狩猎采集民鄂伦春的集落户数规模〉(《岩手大学文化论丛》第六集,2004年3月)一文,整理、删改而成。

关键词: 鄂伦春; 集落; 乌力楞; 构成户数; 集团的流动性

Keywords: Orochon, settlement, wulileng, settlement size, fluid residential grouping

参考文献

- [1] 大塚和議, 草原和森林之民 [M], 东京; 新宿书店, 1988 (日文)。
- [2] 秋浦, 鄂伦春社会的发展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23。
- [3] 遠藤匡俊、张政, 狩猎采集民鄂伦春的集落研究的展开 [J], 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年报, 63, 71-80 (日文)。
- [4] 赤松智成: 总说, 赤松智成, 秋葉 隆, 满蒙的民族和宗教 [M], 东京; 内外出版社, 1941, 1-53 (日文)。

- [5] 森下正明, 与驯鹿在一起[R], 今西锦司, 大兴安岭探险—1942年探险队报告, 东京; 每日新闻社, 1952, 300—307(日文)。
- [6] 泉靖一, 大兴安岭东南部鄂伦春调查报告[R], 民族学研究, 3(1), 1937, 39—106(日文)。
- [7] 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 满洲鄂伦春研究第一篇[R], 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 1939, 101(日文)。
- [8] 吉良龍夫, 急行军[R], 今西锦司编, 大兴安岭探险—1942年探险队报告, 东京; 每日新闻社, 1952, 361—365(日文)。
- [9] 秋葉隆, 吉冈君鄂伦春调查记(三)[R], 满蒙, 17(9), 1936, 109—119(日文)。
- [10] 秋葉隆, 大兴安岭东北部鄂伦春调查报告(一)[R], 京城帝国大学文学会论丛, 4, 1936, 1—48(日文)。
- [11] 郡司彦, 满洲鄂伦春研究(兴安友爱的记·别册)[R], 东京; 自费出版, 1974, 25(日文)。
- [12] 赵复兴, 17世纪初鄂伦春人的庭公社[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1, 1984, 67—73。
- [13] 布林、赵复兴、敖乐奇、莫金臣、满都尔图、杨保隆、侯振华, 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努图克调查[R],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R],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218。
- [14] 秋浦, 鄂伦春社会的发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212。
- [15] 都永浩, 鄂伦春族游猎·定居·发展[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27—51。